

音韻學辭典

湖南出版社

音韻學辭典

臺灣商務印書館

音韻學辭典

YIN YUN XUE CI DIAN

主 编	曹述敬	
副主编	谢纪锋	
编 者	尉迟治平	施向东
	聂 鸿 音	龙庄伟
	黄 易 青	谢纪锋

湖 南 出 版 社

【湘】新登字 001 号

音 韵 学 辞 典

曹述敬 主编

责任编辑：曾大力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5

字数：445,000 印数：1—5,000

ISBN7—5438—0181—7

H·5 定价：8.85 元

共成伟业（代序）

俞 敏

《音韵学辞典》稿，在很久以前我偶然看到过一小部分，多数是草稿。当时留下的印象是：细节还有些可商量的地方。收条目扩大到《经典释文》一类书，这就伸到经学领域里去了。修书的人除龙君庄伟以外，大部分都上过我的课；只有一位没上过，也到我那里问过什么。那深浅我心里有数儿。提到经学，可以说，都不怎么摸门儿——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现在是20世纪80年代了么！人名条用郑玄开头，可能是根据《释文·序录》“为《诗》音有九人：郑玄……”这样的话。可是《序录》又说：“为《尚书》音者四人。孔安国、郑玄……按：汉人不作音，后人所托”。那么上一条就让人犯疑了。三礼后头列的“作音人”，头一个就是“郑玄（三礼音各一卷）”。《尚书音义》“放勋”底下说“放方往反，注同。徐云：‘郑王如字’”。那么“郑音”是从徐邈转引的了。象这样的问题，够经学家“聚讼”几十年的。为多收一条，参加聚讼是白费力气，不参加是回避问题；何苦惹这个麻烦？

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序》说：“有云‘读如’者，比拟其音也。有云‘读为’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这话是从他“引用诸家”里段玉裁《周礼汉读考》里来的。要是郑玄音就指这个说（郑玄没用过直音、反切），那么《地官·阍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丧纪之数”注说“杜子春读‘政’为‘征’”，也可以说“杜音”了（《释文》就是这么写的）。杜子春是王莽国师刘歆的弟子，活到九十岁（明帝时代），难道不配算东汉人、叫第一位作音的大家么？郑玄引用过的许慎《说文》，在走部里“赳”字下说：“读若矫”。也用“读若”，也引经书。他在品部说“《春秋传》曰‘次于岱北’；读与聂同”。这样的话不正是作音的话么？

还在一篇草稿上看见“乾隆乙未进士”。有条签注意见说“同进士出身”。这又牵涉到史学里选举的内容了。清朝殿试榜，我1935年在故宫看见过一张。因为进士里有蔡元培先生，印象极深。鼎甲三名写

“赐进士及第”。二甲大约四十名，写“赐进士出身”。三甲大约五十名，写“赐同进士出身”。这文字基本上和《明史·选举志二》相同。本来通称可以不分别。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里说：“四十年乙未……会试不第，奉命与乙未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他着重在“奉命……”一句，表示“受主知”。在封建文人，感激涕零无足怪。现代人在这上头字斟句酌，就不见得有必要了。

后来全稿由曹述敬先生统稿主编了，我才觉得安心。曹先生是我的老同事，可是往来并不密，可以说“交谈如水”。他是我另一位老同事孙谓宜（崇义）先生的老同学。我每想到谓宜，禁不住慨叹。从我26岁起，只见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声不响，小心细致地低头把自己的一份儿工作规规矩矩完成。如今我73了。他一点儿也没变。我上过一所教会学校，校训有一条儿“服务”。我见过的人常在上头有意无意地加上“为儿孙”这类字眼儿。谓宜并不排斥这种字眼儿，可是他作过的事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加不上这类字眼儿。这就可以叫“纯儒”了，虽然他是拜穆圣的。曹先生的为人也象谓宜。所以我信得过他。他写书纪念钱玄同，让人感觉念旧的情感是真挚的。有些人尊师是为依傍门户，也有人尊师为的是想拿老师当摇钱树。曹先生这本书是为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滑稽其口，孔颜其心的儒者立传的。现在受曹先生的请求写序，百感交集，激动得目眩手战。曹先生的工作态度是可信的。书成于众手，有些可改进的地方或许难免。这也不奇怪。《四库提要》是“钦命”修的，由纪昀统稿。可是我的老师余季豫先生写了长长的《辨正》去纠弹。这不是挑剔，是共成伟业。我想曹先生和他的助手们是欢迎别人提出改善的意见的。

一九八九年秋

序

许嘉璐

国学大师黄季刚（侃）有云：“训诂学为小学之终结。文字、声韵为训诂之资粮，训诂学为文字、声韵之薪向。”又云：“音韵虽在三者为纲领，为先知，而必归于形义始可为锁钥也。”此与今专研纯声韵者之旨趣有异。何以然也？盖中华古学崇实尚用，而声韵之学乃关乎用之巨细远近者。段懋堂（玉裁）云：“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然则声韵之用大矣。昔之所谓治经，今之所谓研究古代文化、治国学耳。故凡欲治国学者，无论文语史哲，咸应习之，知之，谙之，无疑也。余尝谓诸生曰，不精熟声韵而言训诂、治古籍，犹窥门隙而欲得宫室之美，虽可言规模色彩之大略，而欲知其曲折蕴奥，终不可得焉。此言是邪？非邪？试以故事言之。昔在有清，音学鼎盛，是以国学大兴。自顾亭林（炎武）以降，江慎修（永）、戴东原（震）、段懋堂、王怀祖（念孙）、钱竹汀（大昕）诸大家迭出，要皆博治古学而精于声韵者。晚近则俞曲园（樾）、孙仲容（诒让）、章太炎（炳麟）、黄季刚、亦皆一代宗师，而于声韵莫不精。现代学者复何如？前辈文史名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刘盼遂、游国恩诸先生，孰不谙于斯学？由是观之，段、黄之论，至理之言也，余言亦非谬矣。

事有不可料者。延至今日，声韵之学乃成“绝学”。绝者，言习之难，通者眇，而后乏来者也。其难，固也。试观今人研习外语，易乎？而古之声韵在乎古人唇吻，后世不可得闻，唯以目治，固不可一蹴而得之。然观世风，习外语者若鹜，罕有畏其不易而驻足者，何以声韵之难即令学子却步也？盖人之性喜近利而恶远功，愿睹楼堂之丽而厌筑基之烦故耳。声韵之学无近利，亦非可急收其功者，宜其不为世所重也。不宁唯是。今之言古语古字者，诚能本乎仲尼之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亦无不可。然人亦有不可料者，二三学士未近门墙即已缕述宫室之美，匠人之巧，“声近”、“音转”、“假借”、“转注”满

纸，于是古之哲人智语遂成梦呓，知之者骇异，不知者反以为神。斯风既肆，古义何存？此可为学林痛惜者也。

有感于此，诸多学人刻苦传学，欲以己之殷勤度学子以金针，挽狂澜于既倒。十载匪懈，喜见来者之不绝。曹述敬先生即不问可不可而欲度金针者。

先生初从黎劭西（锦熙）先生游，岁暮专注于声韵之学，尝有《钱玄同年谱》、《钱玄同之古音学》诸作。先生怨于声韵教学无资料总汇之不便，遂率同志纂辑《音韵学辞典》。

余观是编，无哗众之意，唯求实之心：放佚旧闻，网罗殆尽；钩玄提要，语不虚设，诚佳制也。教者学者，一编在案，可免寻访之劳，有裨于学林，岂待赘言？至若此书单列“音义”一类，则余有说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经典释文》曰：“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云云，则馆中诸臣亦以为其所“释”者音义并重，此即今语所谓“交叉”“渗透”者也。《四库》不归之于“小学”，有以也，旧以小学类书析为字书、音书、义书，而《释文》之属非音非义、亦音亦义也。然其纳诸“五经总义”类则尤为不伦。案清初朱彝尊即以《释文》与《匡谬正俗》、《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并于“群经”一类。《四库》或袭其例与？盖皆囿于小学三分之法而不敢越藩篱者。今《音韵学辞典》列“音义”一类，是矣，不如此则不显《释文》一类之特性，如此，则足见声音、训诂关系之密，后学者当深悟其奥义焉。

《音韵学辞典》甫成，适余亦毕《传统语言学辞典》之役。二书始同时，遂同期，大小详略，足可相为表里。先生于是以序命余。先生，前辈长者也，以序属诸后学，爱之太过与？抑知余有所欲吐而启之与？余遂妄言如上，僭称之曰序。

一九九〇，八，二十四于日读一卷书屋

前 言

音韵作为一种独立的专门学科，成了高等学校的课程，是晚近的事。以前，音韵学知识只是文字学范围的一部分。唐兰在《中国文字学》里说：“民国六年时，北京大学的文字学，分由两位学者担任，朱宗莱做了一本讲义，叫《文字学形义篇》，钱玄同做的是《文字学音篇》。”“渐渐音韵学独立了，不再挂文字学的招牌。”原先，文字学叫做“小学”。但是，音韵明确地被认为是小学的一部分，也不是很早的。《汉书·艺文志》小学条中虽然有“《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的话，“失读”，“正读”涉及文字的音义，但是《艺文志》中所列小学十家四十五篇，都是后世所谓字书，没有一篇音书，可见汉人所谓小学，还看不出含有音韵学的内容。《旧唐书·经籍志》和宋末王应麟《玉海》的小学类中已经分有声韵、音韵的书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把小学书分成训诂、字书、韵书三类；标明“《广韵》以下编为韵书，”而韵书又自分今韵、古韵、等韵三类。谢启昆作《小学考》，更分小学书为训诂、文字、声韵、音义四类；以魏李登《声类》、晋吕静《韵集》为最早的声韵学专著。而训诂、文字方面的代表作如《尔雅》、《方言》、《史篇》、《说文》等，时代都要早得多。看来小学的内容，无论是就学科形成，还是就专书出现的时间说，音韵学都较训诂、文字两部分为晚。这是习惯的目录学的分类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小学考》规定“训读经史百氏之书属音义”，这样，许多古籍的“音义”，或单为某古籍作音的专书（这种书或称“书音”），便都有了归属。可是散见在古籍注释中许多著名学者的有关文字读音解说的资料（参黄侃《声韵略说·论反切未行以前之证音法》），却往往附丽于文字训诂当中被人忽略了。有人说：“小学是经学的附庸，音韵又是小学的附庸。”这话并非全无道理的。

如果不局限于目录学分类的观点，我们对音韵学的起源及其重要性的看法会很不同的。章太炎在《小学略说》中说：“古字或以音通借，随世相沿。今之声韵，渐多讹变。由是董理小学，以韵学为候人。譬犹旌旗辨色，铎铎习声，耳目之治，未有不相资者焉。言形体者始

《说文》，言故训者始《尔雅》，言音韵者始《声类》。三者偏废，则小学失官。”又说“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在《理惑论》中还说：“治小学者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黄侃在《声韵略说》中说：小学分形、音、义三部。三者之中，又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可见章、黄两位大师都特别重视音韵学。对于著作，两人都极推重《广韵》研究的价值。黄侃尤注意《说文》研究的音韵学意义。他说：“幸也，考音之书，尚有《说文》、《广韵》二编可恃。以《说文》为主，而求制字时之声音；以《广韵》为主，而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然后参之以等韵，较之以今世方言，证据具而理亦明，斯其为音学之盛矣乎！”章太炎在一篇《清代学术之系统》讲演词（《师大月刊》第十期）还说过：小学“可以名为言语学，因为研究小学，目的在于明声音训诂之沿革以通古今语言之转变也。”这就使音韵学从小学、文字学的研究走向语言学了。唐兰为了强调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他在《中国文字学》中说：“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这样说来，上述古籍中的“音义”或只是作音的专书，以及散见于古籍注释中许多著名学者的有关文字读音解说的资料，尽管可以说它是经学的附庸，却理所当然是语言学的正统了。历来争论的是否“孙炎始为反语”（《经典释文》条例），“孙炎始作反音”（《史记正义》论例）虽说不一定，但《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孙叔然（按即孙炎）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尔雅音义》之类的著述可视为音韵学著作的一个部分，想来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反切已是公认的音韵学的内容之一，孙炎的《尔雅音义》虽已失传，原书对汉末反切方法的条例，还有可以考见的。黄侃明白地说：“叔然非但《尔雅》之素臣，抑亦音学之作者已”（《尔雅略说》）。

音韵学的形成虽然稍晚，但它形成之后却发展得较快。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古今几次外来文化的影响，作用；二是一些著名研究成果的吸引，推动。外来文化的影响，最显著的有两次。《颜氏家训·音辞篇》说：自从汉末三国反语大行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

笑”。不久就产生了便利各地人应用的《切韵》。可见魏、晋、南北朝是音韵学大发展时期，韵书出现很多，并且有许多是根据方音方言编写的。钱玄同在为林尹所作《中国声韵学要旨》写的序文中说：“前代学者对于声韵学之研究，萌芽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而双声、迭韵之说大盛。韵书始于魏之李登，继则有吕静、夏侯咏、李粲、阳休之、杜台卿诸人之作，至隋陆法言《切韵》而集其大成。”为什么魏、晋、南北朝双声、迭韵之说大盛、是音韵学大发展时期呢？就因为这时佛学东来，梵语拼音字母、拼音学理传入中国，人们受了翻译或转读佛经的影响，对于字音分析的知识大为增进，极其重视。于是反语的推行，四声的辨认，韵书的体例，字母的排比，以至后来等韵的建立，都与接受当时输入的印度文化大有关系。至于近、现代我国学者受西方语言学、语音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熏陶，用来探讨汉语音韵的现象做出很大的成绩；国外一些汉学专家以其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汉语音韵，也对我国音韵研究在改进研究方法，扩大研究领域、途径诸方面给予很大的启示（包括明代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等人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拼写汉语的方案）；中外学者共同促进了汉语音韵的教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许多学者都讲过《广韵》这部韵书的研究，对全部音韵学的探讨起了很大推动的作用。《声类》、《韵集》以下许多韵书，早已失传，《切韵》原书也亡佚。《切韵》残卷和王仁昫的几种《刊谬补缺切韵》写本的发现，都是晚近的事。章太炎说：“后出之书，独有《广韵》则其粲然者矣。《广韵》者今韵之宗，其以推迹古音，犹从部次；上考《经典释文》及《一切经音义》，旧音绝响，多在其中”（《小学略说》）。钱玄同说：“《广韵》一书实为前代声韵学之总汇。周、秦、两汉之世，未有韵书；自崑山顾君及嘉定钱君以来言古韵者，皆就《广韵》并合离析，而定古韵与古声之部目，至言及声韵类例，更无不沿用《广韵》之成法。……言前代声韵学之名词条例，举无能逾越《广韵》之范围”（林尹《中国声韵学要旨·序》）。钱玄同和黄侃还都特别称赞陈澧《切韵考》一书对全部音韵学的发展作用之大。黄说：“往者，古韵、今韵、等韵之学，各有专家，而苦无条贯。自番禺陈氏出，而后《广韵》之理明；《广韵》明，而后古韵明；今古音尽明，而后等韵之纠纷始解。此音学之进步”（《声韵略说》）。钱说：“近代学者番禺陈君及蕲春黄君先后以

三十六字母与《广韵》中之声纽比勘，审其未尽密合，重为考定，而后魏、晋至唐、宋之声纽始显。”（见同上。按：钱氏这里极口称赞黄侃在《广韵》研究方面的贡献。近据《黄侃声韵学未刊稿》中《重定切韵韵类考》黄氏所作眉批手迹，又知黄氏对“重定切韵韵类”约有四十余条又据钱氏意见旁批“重审”字样。可见钱玄同对《广韵》的研究也是很有贡献的。特附带说明。）最近俞敏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所写词条《汉语音韵学》中评述陈澧作《切韵考》发生的作用就更具体深刻了。俞氏写道：陈澧开始对《广韵》一部书就各个方面作了细致的研究，“这就是彻底分析一批材料内部提供的信息。这跟印欧语史学里所谓一种语言内部的上溯大致相像。从这里开始，方法可以说是相当科学化了。”又道：“《切韵》上承上古音，下开现代音的局面，正是研究音韵学的核心资料。音韵学家许多人各有贡献。但是第一个找着正门的金钥匙的是陈澧。推求上古音韵，解释古方言的，调查现代方言的，都拿《切韵》音系作始发站。”（177页）个别音韵学家或著作能起到推动全部音韵学研究的作用，发生巨大的吸引力，不只陈澧一人，《广韵》一书。清代古韵研究蔚然成风，顾、江、段、戴、孔、王诸人毕世勤劬，各有发明。除了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原因外，顾炎武这位大学者及其所作《音学五书》所发生的吸引力和推动作用，是断断不可轻视的。到了近世，章太炎在音韵学研究方面发生的影响（包括章氏的大弟子黄侃、钱玄同两人长期在南北高等学府开设音韵学课，培养音韵学专家）也是巨大的。前些年人们称赞劳动模范的作用，有句常说的活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真正的学术家、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发生的作用也可以这样说吧。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学术在前进。近几十年来音韵学研究的成绩是更加显著了。先哲时贤名著的启示还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受其影响产生的新著，大都方法更谨严，论述更周密，结论更精确了。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输入和国际音标的应用所发生的影响、作用也更大更普遍了。汉语音韵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新观点、应用新方法、汲取新材料、开扩新领域、现代化的新科学了。特别是近十年来，开设音韵学课程的学校日渐增加，音韵学的专著分门别类地出版了很多。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呈现一种兴盛的气象。出版的著作，无论是教材、通论性质的，还是古音、今音、近代音，或专书、专题、专史的

研究,或有价值的资料汇编,都有许多值得称述的。如研究近代音、等韵学、方音方言调查的专著日多,就是很可喜的现象。只是还没有看见出版过一本《音韵学辞典》。音韵学的专著、教材越多,音韵学知识越普及,《音韵学辞典》的需要性越迫切,这是不言而喻的。新版的综合性辞书《辞海》有按学科分别出版的《语言文字分册》,其中有一部分是音韵学词条,但数量太少,写得也简单。新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语言文字》分卷,汉语音韵学是一个分支学科。大约分支学科条目的数量要受分卷内容的限制,只能严选、不能过多。而且《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性质与一般辞典不同,词条的选录和对释文的要求跟一般辞典都有差别。行将出版的《传统语言学词典》,据我们所知,其中音韵学词条也是一个主要内容。但是都不能代替一部《音韵学辞典》。顾炎武说过:“著书必前之所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戴震在写的《转语二十章自序》中说:“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谓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顾氏对著书的要求既高且严,我们实不敢当。我们编纂这部《音韵学辞典》,只是窃取戴氏“补阙”之义罢了。

辞典的体例和其他著作不同,选材、评述、编排各有特点。除了科学性各种著作都须注意外,一般地说:教材、教程之类的著作理论性、系统性较强;专题、专书研究的著作应有新材料,新观点,或新的研究方法。其实这些要求也都适用于编著辞典。辞典是工具书,首先要考虑读者使用方便。这本辞典共列词目两千三百余条,正文按音序排列,前有音序目录,后有笔画索引,尽量使读者检寻容易。这是编纂方法、形式问题。内容方面:选辞设条,力求能够反映音韵学这一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包括常见术语,古今名著、专家学者。表述力求条理清晰,准确可靠。尽管全学科的内容是分条编写,分散编排,但综合全书各辞条的释文,仍不失为一部自成体系、条目之间有机关联的音韵学著作。这两千三百多辞条内容的总和便相当一部音韵学教材,或者说它是一部音韵学大全了。

这部辞典的使用对象,我们心目中假定为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和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其实这只是个笼统的设想。专业语言文字工作者,高等院校文史系研究生,文科的教师也常需要查考,而社会各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在读书学习时都可用它解决一

些问题。在今天，辞典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一般人治学、应用的工具。音韵学辞典虽然专业性较强，但究竟不同于其他音韵学专著，它的读者对象应该比一般音韵学著作广泛得多。

传统的音韵学一向被认为艰深难学，以至称为“绝学”，弄得人们不敢问津。所以如此，除有些术语确实比较难懂，从前的音韵学家也确有刻意求深、说解玄虚的外，钱玄同认为这是对音韵学的“讥嫫”。为了破除这种误解，钱氏强调：“声韵之学，本人人所当解喻者。世人不明此义，以研治声韵为小学家之专业，与其他诸科无涉。更有横加讥嫫，称治声韵学者为能读天书，一若此乃嗜奇之士故弄狡狴以惑世人者然。”（林尹《中国声韵学要旨·序》）音韵学的功用不只一端。学点音韵学知识对于读书的关系，特别是对读古书的关系是很显然的。用不着我们细说。这里只想说，即使没有上过大学文史系科、听过语文专业的课，只要有一定文化程度，稍为学点音韵学知识往往也会感到音韵学有用，甚且有趣的。学问之事，原有农夫妇孺皆晓，“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顾炎武《日知录》语）；名物词语，也有千年百岁不见于书面文辞，“然耕夫贩妇，尚人人能言之”（章太炎《订文》语）的。这当然有“知其当然”和“知其所以然”的区别。这里恕我啰嗦几句自己对故乡的几个方音、方言问题的认识过程。我的故乡在山西省平顺县北社镇（现在平顺属长治市）。东距平顺县城不远，南和壶关、北和潞城的境界都很靠近。我说平顺话，也熟悉潞城、壶关话。我上大学学习音韵学课以前，也知道字有四声，分平上去入。自己的嘴里明明常发入声音，但因听说北方话没有入声，也就想不到自己的话里会有入声。学了一点音韵学，才知道平顺方音不但有入声，而且入声分阴阳。平顺音：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共有七个调类。由于平、去、入三声都分阴阳，大致可由声调的阴阳分辨字音的声母原来是清音或浊音。又如“北”读 pə，阴入；“之”读 tso，阴入。这同今人假定古音咍、德部字的元音为 ə 是符合的。但“之”字读入声，与“则”同音，比较特别。“则”字在《广韵》属入声德韵；“之”字在《广韵》为止而切，是上平声之韵的标目字，历来都是作平声读的。又如对中古音精、清、从、心、邪诸纽字的今读，和见、溪、群、晓、匣诸纽在今普通话齐齿、撮口两呼前的读音有所区别。因此，按照平顺的方音辨别所谓尖音、团音，可以不加思考。又

如潞城话，中古音知、彻、澄诸纽和章、昌、船、书、常诸纽混淆难分；但知组字、章组字的读音和庄组字庄、初、床、山诸纽字的读音显然不同。知组章组字声纽只拼齐齿、撮口呼，庄组字声纽只拼开口、合口呼。这就反映了所谓照三与照二的区别了（有少数例外，可能是由于切上字的代表字的读音古今发生了变化）。又如，罗常培《中国音韵学导论》中说：“《广韵》真、侵异部，缉、昔不同，而唐胡曾《戏妻族语不正》诗云：‘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这用平顺、潞城的方音读来，十与石，针与真，阴与因，声、韵、调没有任何不同（只有石字，或读阴入，如说石头；或读阳入，如说石灰，石匠。十字只读阳入）。由此可以参证：北方话里失掉 p、m 韵尾由来很久，或者说，北方话里从来就没有过韵尾是 p、m 的韵母。壶关话的显著特点是普通话里的 an 韵字一律读 aŋ；普通话里的 ən 韵字一律读 əŋ；就是说，壶关话的韵母没有鼻声随 n，都用 ŋ 代替。虽然直到现在对于音韵学我也是一知半解，但有了这方面的一点知识以后，结合故乡的方音方言，或联系到平常读书时发现的有关文字音韵的问题，引起了进一步学习音韵学的兴趣，却是一直忘不了的。当然，不能要求人们读辞典。但是，如果因为经常使用这部辞典查考音韵学问题，从而引起学习、钻研音韵学的兴趣，那就是我们很高兴的事了。我们希望这部辞典能够成为读者向音韵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前进的筌蹄。

这本辞典的内容，前面已经提到，《凡例》也有说明。这里再补充几点意思。

一、术语部分。这部分长条、中条较多。对条目的设置和释文，都要求精审。某一术语，一般都表明何人首先使用，见于何种著作。同一术语，如各家使用有异，解释不同，或因时代前后发生变化，都分别交代清楚。释文既注重科学性，注意汲取新的理论观点，又注重准确性，时代性。不张冠李戴，不强古就今。对有争论的问题，择要客观介绍，一般不轻下论断，避免过多论证性的解说。这样，读者查到某一术语，不但仅只了解其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还可获得一些音韵学史的知识。这是本辞典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也算是对音韵学研究做出的一点贡献。

二、著作部分。这部分条目的选择，对古人的著作是力求赅备。这

里有两点应该特别说明。(一)关于音义书。音义书一向属于训诂学范围，这本来是不错的。但如我们前面所说，古人对学术分科的概念不甚明确，单为古籍作音的书，也难免涉及义训；名为“音义”的书，多有研究文字音韵的资料，所以我们对古代的音书、音义书都建立辞条。(二)关于亡佚书。本辞典著作部分的条目中有许多是只有书名，而原书早已亡佚，连写本刻本也没有留下来的。这些佚书的内容，有些可据他书的记载转述一些；有些就只能介绍一个书名和出处。大多数佚书书名的出处是有关条目的编写者从许多典籍，以至地方志中发掘、搜集来的。事实、出处尽量求其可靠。我们所以介绍这些佚书，一方面是尊重前人的劳动创作，同时也希冀通过辞典介绍，引起人们注意，有的佚书能够重新发现。这样做，我们认为是不为无益的。至于今人著作的条目，都是经过遴选才建立的。只是由于我们见闻有限，有的有价值的音韵学著作难免挂漏。这只能以后弥补了。

三、人名部分。建立条目的人物，无论古今都须有专门的音韵学著作。对有发明创造、有贡献、有著作的古今音韵学学者、专家尽量不使遗漏。评价人物，力求客观，准确，尽量从著作、事迹中体现。许多只有佚书的作者，往往事迹也流传下的很少。只能极简单地介绍。当代音韵学学者，如上所述也有由于没有看到他们的著作，因而没有为他们建立条目的。这也只能以后补充了。还有，有些音韵学学者发表过不少音韵学论文，但没有出版专著，限于本书的体例，也没有为他们建立辞条，这是要希望得到谅解的。

这本辞典的撰稿人基本上是谢纪锋、尉迟治平、施向东、聂鸿音、龙庄伟、黄易青六位同志。他们都是经过国内音韵学名家指导、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教师或语言文字工作者。专业修养好，撰稿认真负责。许多艰深的术语，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对著作、人物的评介，勤于搜集资料，查考原作。释文大都观点平妥，内容丰满。可以说都是兢兢业业，为保证辞典的质量付出辛勤劳动的。忝为本辞典的主编，对同志们做出的成绩我感到欣慰，总的说来，对辞典的质量感到满意，愿意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样一部辞典，多数辞条是初次建立，释文缺乏凭借，难度较大。我虽然比较仔细地审阅过全部书稿，也提过些意见，但因水平有限，并不能真正起到所谓“把关”的作用，疏漏和错误之处肯定是难免的。恳切希望读者，特别

是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谢纪锋同志除写了很多辞条的释文外，又任副主编。他对本辞典编辑计划的制订，以及组稿、审稿工作，花费的时间、精力最多。黄易青同志除撰稿外，协助做了全书辞条的索引、编排、校对工作。这都是应该说明的。

辞典的末尾附录了13种表。其中第3至第10、王力所定或所列的8种表，均转录自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种表：罗常培编制的《诸家所考周秦古声异同表》，转录自罗常培遗著《周秦古音研究述略》（据《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第2种表：曹述敬编制的《十七家古韵分部对照表》，转录自拙作《钱玄同的古韵说》（据《钱玄同音学论著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原表附有编制经过的说明，其中章太炎古韵拟测的标音用俞敏说）。一并声明。

俞敏先生、许嘉璐先生为本书作序，启功先生为本书题写书签，我们由衷感谢。俞序标题《共成伟业》，足见对编辑音韵学辞典关切之情。

曹述敬

1990年8月于北京师范大学。